

学术前沿

THE FRONTIERS OF ACADEMIA

FACES OF HISTORY

HISTORICAL INQUIRY
FROM HERODOTUS
TO HERDER

多面的历史

Donald R. Kelley

从希罗多德到
赫尔德的历史探询

〔美〕唐纳德·R·凯利 著

陈恒 宋立宏 译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学术前沿

THE FRONTIERS OF ACADEMIA

多面的历史

从希罗多德到赫尔德的历史探询

【美】唐纳德·R·凯利 著

陈恒 宋立宏 译

*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多面的历史:从希罗多德到赫尔德的历史/(美)凯利著;
陈恒,宋立宏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3.1

(学术前沿)

ISBN 7-108-01751-2

I.多… II.①凯… ②陈… ③宋… III.史学史:
思想史-西方国家 IV.K0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65658 号

责任编辑 冯金红

封面设计 宁成春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3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3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7.75

字 数 380 千字 **图字** 01-2000-1888

印 数 0,001-5,000 册

定 价 28.60 元

学术前沿

总序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素来重视国外学术思想的引介工作,以为颇有助于中国自身思想文化的发展。自80年代中期以来,幸赖著译界和读书界朋友鼎力襄助,我店陆续刊行综合性文库及专题性译丛若干套,在广大读者中产生了良好影响。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随着世界格局的急速变化,学术思想的处境日趋复杂,各种既有的学术范式正遭受严重挑战,而学术研究与社会—文化变迁的相关性则日益凸显。中国社会自70年代末期起,进入了全面转型的急速变迁过程,中国的学术既是对这一变迁的体现,也参与了这一变迁。迄今为止,这一体现和参与都还有待拓宽和深化。由此,为丰富汉语学术思想资源,我们在整理近现代学术成就、大力推动国内学人新创性著述的同时,积极筹划绍介反映最新学术进展的国外著作。“学术前沿”丛书,旨在译介二战结束以来,尤其是本世纪60年代之后国外学术界的前沿性著作(亦含少量二战前即问世,但在战后才引起普遍重视的作品),以期促进中国的学科建设和学术反思,并回应当代学术前沿中的重大难题。

“学术前沿”丛书启动之时,正值世纪交替之际。而现代中国的思想文化历经百余年艰难曲折,正迎来一个有望获得创造性大发展的历史时期。我们愿一如既往,为推动中国学术文化的建设竭尽绵薄。谨序。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7年11月

献给 Paul Kristeller,
并纪念 Myron Gilmore, Felix Gilbert,
Hans Baron 和 Jack Hexter

Man vergilt einem Lehrer schlecht
wenn man immer der schüler bleibt.

(假如一个人总是学生的话,那么他就没有很好地报答他的老师。)

对历史的反思(代译序)

何兆武

人类文明已有了几千年的历史。历史永远有,而人们对历史的警觉并不常有。甚至于可以说,历史上有更多的时代往往是缺乏历史感的时代,是人们缺乏对历史的自我意识,或者说是缺乏历史意识觉醒的时代。诗人雪莱有诗句说:“啊世界,啊人生,啊时间;我在攀登它的顶峰!”这也应该是一个有历史警觉的历史学家所企求攀登的高峰吧。不过,历史是一回事,对历史的意识又是另一回事。在历史上的大多数时期,历史学家们总是缺乏对历史的自我觉醒和反思的。历史是客观存在,但对历史的领悟和觉解却不是客观给定的,也不单纯是客观存在的反映。它首先是德国学人所习惯称之为 *Zeitgeist* (时代精神) 的反射。它不只是消极的反映而已,它是一种积极的外铄。是它,赋给了历史的躯体以生命和灵魂,它就这样形成了历史整体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要研究历史,就要理解历史,这就成其为历史学。而职业的历史学家们却习惯于不加任何批判和反思就迳直下手研究历史,从而漫不经心地忽略了要研究历史,首先要对自己的历史认识进行一番批判的反思。这才是历史学。历史学不是历史,而是对历史认识的觉解。清代诗人、史学家赵翼悼

杜甫的诗句有云：“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越是太平盛世，生活和内容就越平淡，也就越不容易激发人们对历史的警觉意识。我们这一代人半个世纪以前大概会以为：从此以后的生活就只会是安享太平生活之福了。只是后来接踵而至的政治大地震，才把我们从沉睡的大梦之中惊醒，使我们憬然于历史的行程决不像我们想像中的那么轻松而平易，由此仿佛感觉到五千年的历史文化突然之间在我们面前凝结成为立体，它所强加给我们的负担是如此之沉重，竟使我们无所逃避于天地之间。我们是被迫地而又无可奈何地不得不背负起这副沉重的历史十字架。人们习惯于说“盛世修史”。这话其实说错了。盛世的人都是不懂得历史的，他们缺乏对历史（也就是对人性深层的表现）的深层体会，故而是无法了解历史的。只有经历了乱世的人，才有可能真正体会到历史的分量。在这种意义上，也许我们要比古人幸运。因为我们有更多的条件能更深入地体会到什么是历史。客观的世界和历史虽然只有一个，但人们对它的理解和对它所构造的图像，则各有不同，这就是历史必然要不断改写的原因。历史之所以不断地要改写，是因为人们的史学思想是不断地在改变和更新的。

一部分人类文明史大抵上不外是经历两个阶段，即传统社会与近代化的社会。传统社会是一切民族都经历过的。但是近代化的征程，在人类历史上还只有西方文明早着先鞭。其他民族则大都是后来受到了西方的冲击，才迎头（或者随后）赶上去的。当然，这绝非意味着西方的近代化行程提供了一个惟一的模式或样版，所有其他民族的近代化也必须亦步亦趋地重复西方的模式，走西方的道路。每个民族各

有其独特的具体条件与历史文化背景,所以他们各自所采取的形式不会雷同。然而在同时,近代化的征程又必然有其普遍的必然性。所谓近代化必然具有成其为近代化的共同特征,应该有一个共同的尺度和标准,不能有双重的或多重的标准:你有你的标准,我有我的标准,彼此可以毫无共同之处。例如,所谓近代化就必须要有近代科学,而近代科学又是一项系统的整体工程,它需要有近代的思维方式、近代的社会与政治的体制。如果是各有各的标准,可以各行其是、各不相同的话,那么一切所谓的“科学”、“民主”等等近代化的标志,就都成了毫无意义的空话了。

在近代化的道路上,既然西方历史领先于世界先行了一步,那么其中有哪些是带有普遍意义的,又有哪些是只属于本民族的特色的,哪些是属于全人类的共同道路的。在这方面探索上,我们在考察自己的历史发展的过程时,也应该同时了解一下西方的历史学家是怎样在理解和反思他们自己的历史觉醒所经过的路程的。目前这部凯利(Donald R. Kelley)的《多面的历史》所论述的正是从古希腊的希罗多德下迄18世纪德国赫尔德的一系列西方历史学家对西方历史进程的理解或解释。西方历史学由传统步入近代的开阖的大关键,第一幕是文艺复兴运动,第二幕是启蒙运动。本书写到启蒙运动为止,或许是因为这时正值近代化的世界及近代思想已正式确立而工业革命即将大规模展开之际。而工业革命以后的历史则又进入了另一个阶段,需要另写一部历史总结加以阐释了。中国传统的史学,记述人们的历史意识的,已有两千年的历史;但中国近代意义上的史学之记述历史意识的觉醒的,还只有一百年左右的历史,因为我们近代

化的历程也还只有一百年左右。我们自然希望看到我国史学界也有类似的总结性的著作问世,解读我国的历史觉醒是如何从传统转入近代的。它将是我国近代化大业中思想转型不可或缺的一环。本书中译本的问世,将不失为一份可资借鉴的参照系。对于任何一个历史工作者来说,对以往历史学的理解,其重要性是绝不亚于对历史本身的理解的重要性的。

兹值本书中译本杀青之际,三联书店的编辑同志索序于我,匆促之间爰赘数语如上,以应编者的厚意。是为序。

中文版序言

唐纳德·R·凯利

《多面的历史》意欲对西方历史实践与理论的传统作一解释和概括,从有关史前时期历史形式,特别是神话和诗歌形式的一些背景开始叙述,但主要强调的是古希腊第一批奠基者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及其追随者、模仿者和批判者,然后论述的是古代罗马李维和塔西佗的民族史,接着是西塞罗和昆体良的历史之修辞观念。该书也讨论了可以以约瑟夫斯、攸西比戊斯、奥古斯丁为例子的犹太-基督教的传统及其与古典传统的相互交融,接下来讨论的是“蛮族”历史、年代纪、文本注释以及其他一些中庸态度的思想和写作形式。再后来所叙述的话题是近代早期对这些前辈的复兴和继承发展——这就是说,叙述的是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时期的历史学——16 世纪的历史学从“艺术”到“科学”的转变,接着论述的是 17 世纪的历史“方法”、历史博学和古物博学,接着是启蒙时代的世界史、进步的观念、“哲学的”历史,最后止于伏尔泰、吉本和赫尔德的著作。

作者们对直到赫尔德时代为止的大约 2200 年间的历史(*historia*,希罗多德的用语)的这种古老习俗与理想的忠贞(或许有时是排斥),赋予了这种传统或这整套传统以一致

性、语义上的连续性、定义和方向。在一些情况下,欧洲以外的历史研究实践和历史写作实践是早于古典作家和犹太作家的,这种情况特别符合中国,中国的历史编撰传统可以追溯到公元前 11 世纪——这正是《易经》、《书经》和《诗经》的时代。¹ 像希腊 - 罗马时代、犹太 - 基督时代的著作一样,中国的历史也包括成长和衰落的观念、历史的道德效用观念、政治方法和传记方法之间的对比,这在司马迁(公元前 145 - 前 86 年)的《史记》中得到了充分的表现。中国学者不仅撰写传记、年代纪、官方历史 and 世界史,而且论述史学理论,并且回顾自身一致的、连续的传统,中国历史学家和他们的西方同行有许多可比的地方。

然而,这类传统直到它们与西方作家接触以后才成为我叙述的组成部分,才成为欧洲历史探询之智力连续性的组成部分,无论是通过间接的还是直接的翻译。16 世纪以前和西方(除了那些仿效马可·波罗和其他旅行家讲述的故事而流传的不可信的消息外)的这类接触并没有产生实际的意义。或许最重要的是奥古斯丁会修士门多萨(Juan Gonzalez de Mendoza)的《大中华帝国志》(*Historia de las cosas mas notables, ritos y costumbres cdel gran Reyno de la China*, 罗马, 1585 年),该书后来被译为拉丁语、意大利语、德语,至少再版了 63 次,描述的是“强大的王国”和它的省份,记录了中华帝国的人口、经济、政府、制度和行政。² 进一步的消息则来自耶稣会士的报道,特别是从利玛窦开始,他的具有启发意义的信件和报道——这类信件和报道持续了超过四分之一一个世纪——是基于第一手资料基础之上的有关中国的知识。

17 世纪的中国历史、哲学、文化、语言更加直接地——

假如不是被歪曲的话——融入欧洲历史意识。这种文化接受的重心不是中国王朝历史的记录,而是丰富的中国哲学资料的记录,尤其是新儒家之“融入”西方思想,特别是通过耶稣会士在 1687 年出版了《中国哲学家孔子》(*Confucius Sinarum Philosophus*)以及詹森(Lionel Jensen)称为儒家的“制造”的东西。³受这种歪曲的画面和孔夫子的名望影响的作家包括莱布尼兹、沃尔夫(Wolfe)、马勒伯朗士(Malebranche)、伏尔泰、蒙田、卢梭、马布里(Mably)、百科全书学派、拉斐陶(Lafitau)、休谟、魁奈[●]和赫尔德。⁴莱布尼兹在《中国近事》(*Novissima Sinica*)的前言中表明他的中国兴趣有着政治的、知性的动机,莱布尼兹紧随利玛窦的折中的、世界的策略并进一步深入到他自己努力在天主教和新教之间建立和谐的关系,并把中国的表意文字和他的“普遍的特色”的计划联系在一起。伏尔泰以中国文化的素描开始他的《风俗论》叙述,在这段文字中(他利用了利玛窦的资料,但摒弃利玛窦传教性的、耶稣会士的目的),他把中国文化描述为在科学上是落后的,但是在道德哲学上则是先进的,而中国文化所偏好的非教条性的有神论,即自然神论,则值得钦佩。

赫尔德的《今日中国》(*Day China*)仅仅边缘地被认为是历史研究的对象,部分原因是中国似乎处于圣经的框架之外——尽管德经(Joseph Guines)在《匈奴人、土耳其人、蒙古

● 魁奈(Quesnay, 1694 - 1774 年),重农学派的领袖,狄德罗《百科全书》的撰稿者。——译者注[全书当页脚注均为译者注,以下将不一一注明;作者原注为每章之后的章后注释。]

人历史》(*Histoire des Huns, Turcs, et Mongols*)一书中做了虔诚的努力来证明中国是埃及的殖民产物。对于大多数学者而言,中国被认为是一种典型,不管这种典型是一种哲学理想,是一种可怕的无神论例子(比如培尔[Bayle]),一种早熟的具有一神教形态的例子,还是一种关于相异性的主要的例子。18世纪有一种“东方文艺复兴”在形成,但这只局限于古代印度文明和在语言上与它有联系的地方——因此历史地看——这也只局限于通过古代梵语而和它发生联系的西方传统。⁵到18世纪晚期圣经的年代纪已被搅乱,耶稣会士的概要和译自中文著作的东西也发表了;一般来说中国和远东亚文明尽管已被伏尔泰和赫尔德等人纳入世界史的范围,但是用当今流行的话语来说仍旧处于“他者”(Other)的醒目标题下。

近代神话而不是近代历史——换言之,爱好中国者与憎恶中国者而不是真正的汉学家——一直延续到19世纪。根据传统的说法,直到1814年才开始科学研究的阶段,那时在法兰西学院^①设立了中国研究教席(而这里差不多在此前三百年就设立了最早的希腊、希伯来研究教席),担任第一位教席职位的是雷慕沙(Jean Pierre Abel Rémusat)。⁶虽然早在一个多世纪以前俄国人就进行了严肃的研究,但是欧洲其他国家在汉学研究、著述和教学方面甚至比法国还要落后;因此直到兰克时代,欧洲传统下的世界史继续存在缺陷。因此也必须承认在本书中也有许多被遗忘的“多面性”;但是我希望本书在西方的视野内已包括了足够多的重要作者与作品,

① 法兰西学院(Collège de France),是国家支持的研究机构,成立于1530年。

已对西方理论与实践有了足够多的讨论,从而赋予这种叙述某种全面性、连续性和价值——这是有着不同背景和文化的历史学家都渴望的理想。

注 释

- 1 参 Daniel Woolf 编辑的 *A Global History of Historical Writing* (New York, 1998) 中的有关中国历史编撰的文章。
- 2 参 Donald F. Lach, *Asia in the making of Europe*, II (3) (Chicago, 1977), 189ff.
- 3 *Manufacturing Confucianism: Chinese Traditions and Universal Civilization* (Durham, 1997).
- 4 Julia Ching and Willard Oxtoby (ed.), *Discovering China: European Interpretations in the Enlightenment* (Rochester, 1992).
- 5 Raymond Schwab, *The Oriental Renaissance: Europe's Rediscovery of India and the East 1680 - 1880*, (Translated from French by Gene Patterson - Black and Victor Reinking).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4.
- 6 *Black and Victor Reinking* (New York, 1884).

前 言

ix

人们一直在不同的时代与地点,处于不同的条件,为不同的目的,从不同的立场来撰写历史。一部“历史”自身的历史,可以根据各种可变因素——包括特定历史学家的心理特点、社会地位、政治立场,以及所处的文化环境——来撰写,也可以按照历史体裁自身的现象学方法以及已经成为历史学家基本表达手段和心理意识组成部分的现存准则来撰写。这些准则最常见的形式就是声称具有真实性、准确性、贴切性、阐释能力、文字技能、政治或哲学上的功用性,以及能为学者或大众所接受等。当然,这些术语本身不但可以被理解为恒长的智力品质,而且也可以被理解为文化结构、政治状况或文学主题等,总之——就像历史所表明的一样——它们所拥有的意义已超越具体的历史环境。

后者的前提主要是一种“主观主义者”的方法,这不是作者以某种方式深入研究现存文献的方法,而是读者的方法——对于读者来说,某种编撰传统影响下的历史著作在一种意义上是从当时环境中提炼的作品(好像读者能够理解原有的历史语境,其实仍局限于作者的意图),而在另一种意义上,这种历史著作又仅仅是以读者可理解的历史语境为背景的,是瞬间满足现实需要的方法。对读者而言,一切历史都

x

是当代史；在这种意义上，柯林武德的至理名言是适用的。作为读者，我们没人能在一部历史著作诞生之时在场，我们也不可能再现那种虚拟的作者环境，除非以现存的受那时历史编撰传统影响的概念资源和修辞技巧为媒介。

本书不但采纳阅读历史所采取的这种彻底的诠释方法，而且坚持以来自于和服务于当代观点的态度来构建历史编撰的意义。希罗多德、修昔底德以及他们的继承者为后人撰写历史——就目前来讲，我们就是这种意义上的后人。本书提供的是经由目前所能得到的原始材料和第二手评论得出的有关史学史的个人观点；它不是历史编撰发展的大事编年，而是作为对智力传统，甚至对（一些读者所谓的）经典进行反思的一种解释。这个主题自大学时代以来就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中。就欧洲历史思想和历史编撰的一些领域发表了详细的论述之后，我决定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进行一次综合，这些研究始于我大学四年级时写的一篇文章，如果记忆无误的话，它与阿克顿勋爵有关（如果不是始于我二年级对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的研究的话），并在随后出版的大量专著和文章中得以继续。我不总是同意我的许多早期著述，但我仍然在许多方面信任这种探询和判断的思路。

那时我是从历史是一种探询形式——它不是一项智力工程的目标或主题，而是智力工程的开始——这一观念（我使用这个观念无需得到柯林武德的授权）开始研究的。多年的研究更加加强了这种认识——这种认识最初由希罗多德以其固有的率直天真而提出——尽管对“历史是什么？”这一问题必须给出许多答案，这些答案可能会发挥或者甚至突破由希罗多德及其继承者所提出的探询准则。在过去二千

五百年间,这些经常是精心雕琢而成的答案也构成了西方历史编撰的一个组成部分(甚至在有文字之前[*ante litteram*]就是如此),但是这中间没有哪一种答案可以否定希罗多德和柯林武德的观念:历史在本质上是对人类环境无休止的探询。西方历史编撰发展的较早阶段更是如此,这(而不是当代史)也正是我的主旨所在。

自我第一次天真地顿悟以来的几乎五十年间,我学到了很多东 xi
西,并深深地为之感动,通过哲学、人文科学(社会学,然后是人类学)、文学批评诸领域的辩论,我形成了对历史实践与理论的看法,尤其是关于它的局限性的看法。我对理解迦达默尔所谓的“语言背后之物”(behind the back of language)的可能性表示怀疑——如迦达默尔所说,或者对发现一种超越文化界限的(无论如何我们是给文化下定义的)阿基米德式的支点的可能性表示怀疑。文化是一个海洋,我们可在其中游来游去,尽管我们努力去研究,尽管我们有技术上的各种奇迹,但我们仍然是——至少我们历史学家仍然是——(这个文化)海洋中的鱼,而不是海洋学家。

在任何情况下,诠释上的困境意识似乎适合于现实中的历史学家,尤其适合于编撰这种现实历史以及阐述其背后一些理论的人。我认为,在原则上,这种观点甚至比哲学家、文学理论家甚至民族方法学家的观点更加不方便,但就我的目的而言这的确十分关键,我将向大家展现一位历史学家基于文献研究基础之上的有关历史探询传统的认识,而文献和“历史”的观念有语意上的联系,犹如现在的“我们”所理解的文献一样。历史研究并不能改变世界,或许可以感动大众,我希望这种方法至少可以提供,假如不能补救的话,理解